

中东热点

埃及“1·25革命”与伊朗伊斯兰革命之比较

范鸿达

摘要: 埃及“1·25革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都以创建国家新制度为主要诉求。从革命外围形势来看,埃及“1·25革命”要优于伊朗伊斯兰革命;从革命力量看,伊朗有明确的革命领袖和相当统一的革命力量,而埃及革命则缺乏领袖、力量分散;从革命进程看,伊朗伊斯兰革命是经过长期的酝酿才发动的,而埃及革命则是由偶发的事件催生而突然发起的;从革命结果来看,伊朗革命创建了伊斯兰共和国,而埃及革命则没有导致国家政治制度的创新。埃及“1·25革命”没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其爆发的突然性和革命力量的分散性,以及完备行动方案的缺失和革命目标设定的模糊与不切实际。

关键词: 埃及“1·25革命”; 伊朗伊斯兰革命; 政治发展; 民主转型

作者简介: 范鸿达, 博士, 厦门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福建厦门 100000)。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5)06-0058-14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埃及“1·25革命”^①和伊朗伊斯兰革命都是要推翻既有国家领导人或政体,并期望构建新的政治体制的群众运动。尽管“1·25革命”在时间上比伊斯兰革命晚了三十多年,而这个时间段也恰恰是民主思想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迅速普及的节点,且“1·25革命”爆发后其参与者还得到美欧诸大国的“民主”声援和帮助,但是相比较伊朗伊斯兰革命迅速结出延续至今的“伊斯兰共和国”之果实,埃及“1·25革命”革命在制度创建方面可谓一无所获。国内

① 目前国内中东研究领域仍然对始于2011年1月25日的埃及政治动荡能不能被称为“革命”而争论不休,笔者认为这样的争论没有意义,因为不管中国各方如何解读,国际社会对埃及那个事件的最广泛冠名就是“1·25革命”,这就如同尽管国内媒体非常纠结于如何称呼2010年以来阿拉伯多国的政治动荡,可“阿拉伯之春”就是它的国际通称。

外专家学者对这两场革命已经分别给予了相当研究^①,但是对其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很难见到。本文旨在通过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和埃及“1·25革命”的对比研究,并在对革命后埃及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探求埃及“1·25革命”最终失败的原因。

一、革命对象之比较

伊朗伊斯兰革命和埃及“1·25革命”的对象分别是巴列维国王和穆巴拉克总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日渐不得人心的政治体制。巴列维国王1941年登基,1979年初黯然出走他国;穆巴拉克总统1981年上任,2011年初被赶下台,他们两位均担任国家元首长达三十(余)年。不可否认,不管是巴列维国王还是穆巴拉克总统,都曾励精图治发展国家,但是各自的误政和既定的政治制度,最终还是把他们推到了历史的审判台。

(一) 伊朗巴列维国王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最直接对象是巴列维王朝末任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1919年出生,1941年登基)。

在1941年希特勒德国大肆侵略、英苏为了自身利益联合出兵占领伊朗的严峻情势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接替被迫退位的父亲,成为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第二任国王,俗称巴列维国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英美三大国在伊朗皆有驻军,巴列维国王对国家的领导力自然也就相当有限。但是随着冷战的兴起和愈演愈烈,伊朗在美国战略中的价值迅速提升,于是美国帮助伊朗先后摆脱了苏联和英国的长期盘剥,并策划组织了令巴列维国王权力失而复得的伊

^① 国内外主要著述有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Said Amir Arjomand, *The Turban for the Crown: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Shaul Bakhash, *The Reign of the Ayatollahs: Iran and the Islamic 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Nikki R. Keddie, *Modern Iran: Roots and Results of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Hatem Rushdy, *18 Days in Tahrir: Stories From Egypt's Revolution*, Haven Books Limited, 2011; 毕健康《从巴列维王朝的突然倾覆看伊朗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载《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陈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伊朗外交研究所《巴列维王朝的兴衰——伊朗前情报总管的揭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范鸿达《伊朗与美国:从朋友到仇敌》,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毕健康《文明交往、国家构建与埃及发展》,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1期;范鸿达、岳非平:《“1·25革命”前后埃及政治转型比较》,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4期;王林聪《埃及政治转型败局警示》,载《人民论坛》2013年第23期;王林聪《埃及政治转型的困境和出路》,载《当代世界》2013年第11期等。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已经过去多年,所以对它的研究比较深入,而目前对埃及“1·25革命”的研究还处于观察阶段,富有价值的成果还不多。

朗 1953 年政变,并且在其后对伊朗提供了全方位援助。华盛顿上述伊朗政策的实施不仅赢得了德黑兰的友谊,而且也把巴列维国王推到了国家独裁者之位。^①

尽管巴列维国王在权力巩固后励精图治,希望把伊朗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但是他的专制统治也遭遇到接连不断的挑战。因为巴列维国王在 1960 年开启的以土地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白色革命”严重伤害到宗教界的利益,再加上他日益突出的世俗化、西方化政策倾向,这使得在伊朗享有重大影响力的宗教界与巴列维国王渐行渐远,1964 年宗教领袖霍梅尼被捕,继而流放他国,标志着宗教界与国王的彻底决裂。从此,巴列维国王便面临着一个明确的反对力量——伊朗宗教阶层,也面临着一个明确的反对派领袖——霍梅尼。^②

随着国际油价的提升和石油出口量的增加,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伊朗石油美元激增,但是巴列维国王把大量石油美元投入到国防和军事建设中,对民生领域的投资重视不够,这使得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与国家石油收入的剧增不相匹配。再者,王室和统治阶层的普遍贪污腐败,以及伊朗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和特务组织,不仅令民众心生怨恨,也让官员们缺乏安全感。^③此外,巴列维国王的亲美外交也颇受争议。这样,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巴列维国王身陷众叛亲离的惨淡处境,其在国内的统治基础日益动摇不定。

当巴列维国王在伊朗国内遭遇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时,其长期以来最坚定的外部支持者美国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巴列维怀有称霸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图谋,也有把伊朗发展成为世界第五强国的计划,其外交独立性越来越强,作为地区霸权国家的伊朗和世界霸权的美国在战略上越发冲突,而且巴列维国王对提升国际油价的推动也让美国这个世界头号石油消费国非常愤怒。^④而与此同时,随着以色列国力的增强、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稳定以及埃及外交的转向,伊朗相对于美国的价值却在不断下降,这导致当巴列维国王在二

① 参阅范鸿达《伊朗与美国:从朋友到仇敌》,第 29~51 页。

② 关于伊朗宗教势力特别是霍梅尼与巴列维王朝的紧张关系,可参阅[奥]海因茨·努斯鲍默著,倪卫译《霍梅尼》,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年版。

③ 关于伊朗的秘密警察和特务机构的活动情况,可参阅[法]热拉德·德·维利埃等著,张许萍译《巴列维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第 299~312 页。

④ See Mark J. Gasiorowski, *U. 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 Building a Client State in Ira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08-209. 美国学者 Andrew L. Johns 甚至认为,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美国伊朗关系已经从鲜明的一主一仆关系接近为平等关系了,见 Andrew L. Johns,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the Shah of Iran,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U. S.-Iranian Relations, 1965-1967: 'Tired of Being Treated Like a Schoolboy',"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9, No. 2, p. 89.

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面对国内危机时,曾经的密友美国已经不再是他的可靠依仗了。^①

(二) 埃及穆巴拉克总统

埃及“1·25革命”的最直接对象是任职该国总统已达三十余年的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Muhammed Hosni Mubarak)。1981年10月6日,埃及前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身为副总统的穆巴拉克随之成为埃及共和国第四任总统,并在此之后的三十年中一直担任该职。

穆巴拉克的个人命运与埃及共和国的威权政体息息相关,或者说,他是埃及威权政治的继承者和其矛盾累积的承担者。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推翻该国的法鲁克王朝,并于次年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1954年出任总统的纳赛尔在治理国家的方式上表现出非常强势的一面,他给予反对势力残酷镇压。^②1970年9月萨达特接替逝世的纳赛尔出任总统后,认识到既有的威权政治已经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再加上盟友美国的推动,萨达特开启了政治改革进程,但是他的改革缺乏政治精英和民众的支持,因此难言成功。^③1981年接任埃及总统的穆巴拉克不得不面对萨达特时代遗留下来的诸如经济不景气、在阿拉伯世界的严重孤立、国内政治气氛紧张等困局,穆巴拉克总统上台后被迫进行了一些改革,最显著的变化在于政治多元化趋势明显加强,议会、司法、政党、选举制度渐趋完善,政治的制度化水平有所提高,至少在表面上具备了宪政民主的基本架构。

但遗憾的是,民主化只是穆巴拉克维持威权政体生存的权宜之计,穆巴拉克进行议会和政党制度改革的原因在于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专制统治造成威权政权陷入合法性真空,加之穆巴拉克地位尚不稳固,需要打造自身的民主形象以迎合国内外的期待。赋予司法机构一定的独立性也有着现实的需求,一方面改变人们对总统独大的恶劣印象,另一方面政府进行市场化改革、惩治腐败也需要配套的司法工具,以此减少国家干预。穆巴拉克推行的民主虚假至此,其代表的威权主义之合法性自然是日渐减退;而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需要更强的个人专制,结果在政治上穆巴拉克的执政陷入了一个无可自拔的恶性循环之中。与此同时,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和官员腐败也令穆巴拉克执政后期还

① 范鸿达《伊朗与美国:从朋友到仇敌》,第58~59页。

② Tamir Moustafa, *The Struggle for Constitutional Power: Law, 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gyp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97.

③ 毕健康《浅析当代埃及政党制度的演进》,载《世界历史》,2001年第5期,第115页。亦可参阅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算可观的经济增速黯然失色。

不过,在 2010 年底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爆发和推翻该国总统之前,尽管埃及国内对穆巴拉克的威权统治也是颇有微词,但是他在国内遇到的危机并没有达到生死存在的严峻程度,其既有的外部支持(以美国为首)也并未减损,事实上,“1·25 革命”前夕的穆巴拉克总统之处境要胜过伊斯兰革命前夕的巴列维国王。

二、革命力量之比较

伊朗伊斯兰革命和埃及“1·25 革命”都是深具群众基础的民众抗争运动,社会参与面均非常广泛。但是二者也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别,伊朗伊斯兰革命拥有一位具有广泛社会认同的(精神)领袖霍梅尼,而且以霍梅尼为代表的伊朗伊斯兰反国王势力是一个持续性存在。反观埃及的“1·25 革命”,它不仅缺乏具有全民性号召力的领袖,而且革命前的埃及也没有反穆巴拉克总统的组织性行动传统。

(一) 伊朗伊斯兰革命力量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伊朗革命之所以被冠以“伊斯兰”的名号,是因为革命的主导者是以霍梅尼为核心的伊斯兰力量,他们掀起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以伊斯兰原则为导向的新政权模式。

1902 年出生的霍梅尼从小受教于伊斯兰学校,研读《古兰经》和其他一些宗教书籍,少年时期他曾到伊拉克求学伊斯兰知识,学成后一直定居于伊朗伊斯兰教圣城库姆,并成为一位学识渊博、身负众望的伊斯兰宗教领袖。^① 他始终对巴列维王朝充满了仇恨,他把父亲的罹难、小女的溺毙和长子的暴亡都视为王朝之罪,巴列维国王对伊斯兰教的漠视也让他愤怒。^②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因为“白色革命”和授予在美国的军事专家法律豁免权等问题,霍梅尼接连展开了对巴列维国王的反抗和抨击,结果早已被巴列维国王视为异己的霍梅尼于 1964 年 11 月惨遭驱逐出境的厄运,开始了其长达 14 年有余的流放生活。霍梅尼先是在土耳其流亡,1965 年 9 月又转移到伊拉克纳贾夫,直到 1978 年 10 月才离开那里到法国巴黎近郊流亡。

因为在霍梅尼流亡伊拉克时期伊朗和伊拉克这对邻国的关系相当糟糕,所

① Yonah Alexander, Milton Hoenig, *The New Iranian Leadership: Ahmadinejad, Terrorism, Nuclear Ambition, and the Middle East*, Westpor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8, pp. 24-25.

② [奥]海因茨·努斯鲍默《霍梅尼》,第 54 页。

以作为巴列维国王反对派的霍梅尼在伊拉克享有较为广泛的活动空间,这也使得霍梅尼的影响并没有因为离开伊朗而遭受减损,其渊博的伊斯兰教学识和浓烈的反抗精神仍然备受伊朗民众关注。1970年6月,库姆48位阿亚图拉集体宣布拥戴霍梅尼为“大阿亚图拉”,坚决支持他在伊朗进行伊斯兰革命的政治纲领,即建立伊斯兰政府、实现教法学家的统治、反对君主制以及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①霍梅尼的名声日益隆盛,国内外的追随者不断增多,逐渐成为伊朗甚至全世界什叶派穆斯林的精神导师。

到1977年伊朗国内反巴列维国王运动日渐高涨之时,尽管各派力量对巴列维国王后的伊朗都有自己的设想,但是它们也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无力和以霍梅尼为首的伊斯兰力量进行正面角逐,所以也就能够接受霍梅尼在新伊朗的主导性存在。特别是当霍梅尼抵达法国后,面对伊朗已经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动荡局面,伊朗各反对派领导人纷纷奔赴其在巴黎近郊的流亡处,聆听他对伊朗革命的指导和对未来国家发展的建议,霍梅尼的反对派(精神)领袖地位已经毋庸置疑,他也成为反对派与巴列维国王对抗的鲜明符号。

(二) 埃及“1·25 革命”革命力量

在观察埃及“1·25 革命”前的情势时,一个不得不注意的事实是,尽管当时穆巴拉克总统面临的国内危机日益上升,但反对派的力量却是相当分散,没有任何一个反对派具有号召和整合其他反对派的力量和能力。就国内局势的紧迫程度而言,革命前穆巴拉克总统承受的压力要比当初的巴列维国王小一些。

埃及在1953年成立共和国后走的是世俗化发展路线,宗教阶层没有形成一股较为强大的力量,更没有出现类似霍梅尼那样深具政治号召力的宗教领袖,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二十世纪以来埃及社会对伊斯兰力量的持续警惕,事实上,长期以来埃及并不存在合法且具有普遍影响力的伊斯兰力量。1928年成立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是当代埃及最具组织力和动员力的宗教/政治团体,但是它在埃及的发展环境很不理想,不管是在法鲁克王朝时期还是在共和国时期,穆兄会都曾遭受政府的强力打压,并因此而长期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再加上埃及社会由来已久的世俗化发展倾向,民众对有伊斯兰情结的穆兄会也是多有抵触,从而导致一直到“1·25 革命”爆发前夕,穆兄会获得的

^① 安维华、刘竞《现代海湾国家政治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274页。

社会认同度并不高,自然它也就难以成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导力量。^①

埃及共和国成立后奉行的是威权政治模式,政党存在的空间非常有限,纳赛尔总统在 1953 年解散了所有政党,后来只是出于自身需要才成立了执政党,这使得非宗教色彩的强大反对派在埃及也难以出现。尽管萨达特在 1970 年接替纳赛尔出任总统后逐步建立多党制,但是成立新政党的条件非常苛刻,为数极少的几个新政党也基本上是从原执政党中分化出来的派系,缺乏社会和民意基础。穆巴拉克在 1981 年出任总统后推动有限多党制向宽松多党制转变,这使得政党数量得以增加,比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合法政党只有 5 个,而到 2010 年就已经有 23 个之多了。^② 不过反对党数量的增加非但没能推动政治多元化,反而成为政权分化反对派的工具,埃及的选举是统治者分配政治权力的机制,将执政党和反对党都纳入到该机制之中,使他们失去反抗现政权的动力。^③

这样,在长期的世俗化倾向和威权政体的高压之下,直至“1·25 革命”爆发前夕,尽管民众对穆巴拉克政权呈现出普遍的(私下)不满,但是埃及并没有产生深孚众望的反对派领袖和政党/团体。在埃及反对派整体分散的状况下,穆斯林兄弟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前任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M. El Baradei)已经算是比较突出的团体和个人了,但是巴拉迪并没有自己有形的强大政治力量作为支撑,而穆兄会又被打压已久,使埃及多数民众对其警惕有加,所以一言以蔽之,不管是巴拉迪还是穆兄会,也都无力承担“1·25 革命”领袖之显要角色。

三、革命进程和结果之比较

在进程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和埃及“1·25 革命”存有重大差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伊朗民众对巴列维国王的抗争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伊斯兰革

① 关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情况,可参阅 Brynjar Lia, *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 in Egypt: The Rise of an Islamic Mass Movement 1928 - 1942*, Reading, UK: Ithaca Press, 2006; Barry Rubin, *The Muslim Brotherhood: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cies of a Global Islamist Movemen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Carrie Rosefsky Wickham, *The Muslim Brotherhood: Evolution of an Islamist Move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Shadi Hamid, *Temptations of Power: Islamists and Illiberal Democracy in a New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② See Wikipedia, “List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Egypt”,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political_parties_in_Egypt (2014 - 12 - 8).

③ Kevin Koehler, “Authoritarian Elections in Egypt: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l Mechanisms of Rule”, pp. 974 - 989

命也有自己明确的终极目标——构建“伊斯兰政府”，所以伊斯兰革命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和层次感。埃及“1·25 革命”则不尽然，它是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刺激下突然爆发的一场民众运动，虽然其推翻穆巴拉克总统有广泛共识，但是其后的发展计划却并不明确且缺乏具体的行动方案，故混乱充斥其中。

（一）伊朗伊斯兰革命进程和结果

自 1963 年在宗教圣城库姆开展反巴列维国王的行动后，霍梅尼及其支持者就没停止过对国王的抗争，特别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这种抗争愈演愈烈。1977 年 12 月，流亡伊拉克的霍梅尼向国内学生和信徒发出反国王的“圣战”号召；1978 年初伊朗《新闻报》刊登的一篇被认为亵渎霍梅尼的文章，引发数千名神学院学生在 1 月 7~9 日于库姆举行抗议游行示威，政府随后的镇压导致约 70 人死亡、400 人受伤，库姆流血事件点燃了 1978~1979 年伊斯兰革命的火焰。^①

在巴列维国王统治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1978 年 9 月 4~5 日，反对派接连在德黑兰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更为激进的反对派领导人进而呼吁与政府彻底决裂并号召举行全国总罢工。鉴于此等危机状况，政府在 9 月 7 日晚上宣布实施戒严法，但是很多的人并没有及时获知这一消息，以致当次日清晨两万人聚集在亚拉赫广场（Jaleh Square）时，他们中的大多数还不知道政府已经禁止了 3 个人以上的集会。在军队命令示威群众散开遭拒后，士兵向人群开了火，结果造成重大伤亡。^②“黑色星期五”随之成为 9 月 8 日血腥事件的代称，它大大推进了伊朗的革命进程，那些先前对巴列维国王还抱有一线希望、主张在伊朗建立真正的立宪君主制的民族阵线以及温和的宗教势力也几乎完全倒向了坚决主张把国王赶下台的霍梅尼阵营，此后推翻巴列维政权的口号响彻全伊朗。

尽管霍梅尼在 1978 年 10 月被迫离开伊拉克转而到法国流亡，与伊朗的距离远了，但是他对伊朗国内局势的影响力却没有减损。在法国流亡期间，霍梅尼通过库姆的伊斯兰抵抗运动总部等途径，指导和号召伊朗民众进行反对国王斗争，伊朗国内各反对派力量也纷纷去法国聆听霍梅尼的革命建议和指导，甚

① 华黎明《28 年前，在伊朗感受“革命”》，载《世界知识》2007 年第 7 期，第 56~58 页。

② 关于死亡数字，反对派称他们死了 1000 多人，政府的统计是 122 人死亡，而处理这次屠杀的医方则估计有 300~400 人丧生。见 John D. Stempel, *Inside the Iranian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15-117。伊朗人认为在革命成功前的 14 个月中，共有 6500~7000 人在参加反政府游行示威时被射杀，这个数字虽然有些夸大，但也不是毫无边际，详情请参阅 Richard W. Cottam, “Iran and the Middle East,” in Steven L. Spiegel, ed.,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ern Allianc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82, p. 216。

至巴列维国王的经年盟友美国也主动与霍梅尼接近。12 月 10 ~ 11 日,德黑兰爆发有成百万群众参加的大规模游行示威,组织者发表的 17 点声明要求结束君主制、接受霍梅尼为最高领导人、建立伊斯兰政府、恢复农业、保护宗教和让流放者回国等。^① 随着伊朗国内混乱的加剧,美国也日益倾向于抛弃巴列维国王。^② 走投无路的巴列维国王在国内局势和美国的双重压力下,被迫于 1979 年 1 月 16 日出走他国。

把巴列维国王赶下台只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阶段性目标,而非终极归宿。在巴列维国王踏上流亡海外的征途后,众望所归的霍梅尼回国便没有了重大障碍。2 月 1 日,在民众的翘首期盼中,流亡海外 15 年的霍梅尼回到伊朗德黑兰,之后便成立了自己的政府;2 月 11 日巴列维国王的最后一任政府垮台,霍梅尼力量接管了全国。4 月 1 日,延续至今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伊斯兰革命在伊朗取得最终胜利。

(二) 埃及“1·25 革命”进程和结果

与伊朗伊斯兰革命不同,埃及“1·25 革命”带有强烈的偶发性,它是在突尼斯民众革命的刺激下突然爆发的。2010 年 12 月 17 日,突尼斯爆发所谓的“茉莉花革命”,用了短短二十几天,突尼斯民众就把自 1987 年以来一直担任总统的本·阿里赶下台。受此鼓舞,埃及“4 月 6 日青年运动”发出在 2011 年 1 月 25 日举行反抗警察暴力的大游行^③,对穆巴拉克总统身怀不满的埃及民众对此给予了热烈响应,在 25 日纷纷走上开罗、亚历山大、苏伊士等大城市街头,埃及“1·25 革命”由是爆发。埃及游行示威者的主要诉求包括穆巴拉克总统下台、终止紧急状态法、获得自由和正义的权利、组建一个负责任的民选政府等。

尽管埃及“1·25 革命”缺乏有足够影响力的领导势力或个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埃及民众取得革命的初步胜利——把穆巴拉克总统下台,这也是各支(非亲穆巴拉克)力量共同的心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埃及各大城市的游行示威日渐升级,而且示威者与警察、亲穆巴拉克力量也爆发了接连不断的暴力冲突。面对此景,穆巴拉克总统在 2 月 1 日宣布不再寻求下一个总统任期。在穆巴拉克遭遇国内困境时,美欧等穆巴拉克总统的前友邦也纷纷改弦易辙,呼吁穆巴拉克顺从民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的态度,不仅要求接受美国援助和帮助的埃及军队保持中立,而且还越发强烈地要求穆巴拉克总统下台。内外

① 华黎明《28 年前,在伊朗感受“革命”》,第 56 - 58 页。

② 范鸿达《伊朗与美国:从朋友到仇敌》,第 70 ~ 77 页。

③ 关于该组织的情况,参见维基百科(Wikipedia),“April 6 Youth Movement,”http://en.wikipedia.org/wiki/April_6_Youth_Movement.

交困之下 穆巴拉克总统于 2 月 11 日辞去总统之职。^① “打破旧世界”的革命目标得以实现。

但是 在接下来面对“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目标时,“1·25 革命”的参与者却陷入了迷惘。穆巴拉克被推翻后,选举新总统便成为埃及的当务之急,各派力量围绕 2011 年底开始的议会选举和 2012 年 6 月的总统大选进行激烈角逐。在 2012 年 6 月的总统选举中,最后的对决在穆尔西和萨菲克之间开展,穆尔西代表穆斯林兄弟会的自由与正义党,萨菲克则是穆巴拉克总统任命的最后一位总理,公布的结果显示,穆尔西和萨菲克的得票比为 51.73%:48.24%。

穆尔西的获胜曾经被看作是穆斯林兄弟会春天的来临,但之后埃及政局的发展却无情地否定了这个说法。在 2012 年 6 月 30 日开启其总统生涯后,穆尔西总统面临着一个再次逐渐走向混乱的埃及,支持或反对他的游行示威此起彼伏,结果仅仅过了一年,埃及军方就废黜了民选总统穆尔西。在 2014 年 5 月下旬进行的总统选举中,前军方领导人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当选。“1·25 革命”以埃及三年半的极度动荡,换来了一个简单的政治轮回——在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之后,埃及共和国又迎来了一位新的前军方领导人总统,而且国家治理架构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埃及“1·25 革命”难言成功。

四、埃及“1·25 革命”为何没能成功?

就革命的区域/国际环境而言,埃及“1·25 革命”比伊朗伊斯兰革命具备更好的外部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诉求很明确,就是在推翻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后,建立以宗教领袖为国家核心人物的伊斯兰政治体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威信扫地的状况下,充满宗教精神和情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对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很多民众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对阿拉伯国家的当权者来讲是一个大麻烦,所以,邻国政府对伊朗伊斯兰革命持消极甚至是反对态度。再者,因为霍梅尼思想中鲜明的反美反西方色彩,以及与无神论思想的相悖,所以不管是美欧诸国还是苏联,都没有站在以霍梅尼为代表的伊斯兰革命势力一边。

而埃及“1·25 革命”则不然,它是在“阿拉伯之春”的大背景下爆发的,突尼斯、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周边多国均发生了以民主为导向的民众运动,埃及的革命者并不孤单,而且焦头烂额的区域内国家也难以他顾,这使得埃及

^① See Wikipedia, “Egyptian Revolution of 20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Egyptian_Revolution_of_2011.

“1·25 革命”没有受到周边国家的强力抵制和打压。另一方面,当“1·25 革命”爆发后不久,美国和欧盟大国就旗帜鲜明地站在了革命势力一边。伊朗伊斯兰革命和埃及“1·25 革命”两相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埃及“1·25 革命”的外部环境更好,但是它没有取得伊朗伊斯兰革命那样的成绩,这只能从埃及的内部革命条件去找原因了。

(一) 在“1·25 革命”前埃及的民主基础仍相当薄弱

虽然埃及这片土地孕育了非常辉煌的古代文明,但这毕竟是其历史长河中的短暂一瞬,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埃及是作为他国他族的统治地、占领地或保护国而存在,直到 1922 年埃及才从英国那里获得部分独立,如是之历史经历,再加上伊斯兰的宗教信仰,使埃及很难成为西方式民主思想的沃土。再者,1952 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后,最终赢得国家真正独立的埃及建立起威权政体,在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等三位总统的强势领导下,民众的很多基本权利都难以得到实现,埃及自然无法结出西方式民主之果。

按照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马歇尔的观点,民主是由一系列公民权利所组成,公民权利包括公民的基础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①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种权利是分阶段实现的,政治权利的实现必须以基础权利得到保障为前提,只有公民的基础性权利和政治权利得以实现,公民才能享受更多的社会权利。^②而埃及的“民主”推动者们忽视了埃及威权主义国家民众的基础权利还相当不足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直接跃进对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诉求,显然脱离了民主的发展阶段。

(二) 埃及“1·25 革命”带有明显的突发性,缺乏成功革命所必备的循序渐进

在埃及尚不具备西方式民主基础的情况下,以民主为主要诉求的“1·25 革命”因为外界的刺激而突然爆发,与伊朗伊斯兰革命相比,它缺乏革命成功所必备的严密组织与筹划。霍梅尼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站在了巴列维国王的对立面,即使是流亡国外,他也通过清真寺等多种途径对国内反巴列维国王力量产生日益增大的影响。事实上,迫使巴列维国王在 1979 年初出走伊朗的不仅仅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伊斯兰革命,还有此前十几年反国王势力的持续努力,对国王连续且有组织的反抗,是伊斯兰革命最终成功的关键保障。

反观埃及“1·25 革命”,它是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迅速推翻长期执政的

① 参见[英]T. 马歇尔、吉登斯著,郭中华、刘训练编《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② 关于各项公民权利的具体内容参见托马斯·雅诺斯基、布雷恩·格兰《政治公民权:权利的根基》,载[英]恩新·伊辛、布雷恩·特纳著,王小章译《公民权研究手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0~21 页。

本·阿里总统的鼓舞下,以互联网为纽带而突然爆发的,尽管游行示威者对穆巴拉克总统的不满也是由来已久,但是他们缺乏有效的组织,而且还缺乏对不同反对派都具有足够影响的革命领袖。就革命的两个步骤而言,“1·25 革命”虽然具备了埋葬旧世界的条件,但是却没有建设新世界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在“1·25 革命”爆发十几天后,担任埃及总统长达三十年的穆巴拉克就黯然离职,但是之后埃及各派力量围绕国家前途产生了严重分歧,剧烈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自然也就随之而来,在历经民选非军人总统穆尔西的短暂执政后,埃及选民于 2014 年 5 月选择前军方领导人塞西出任他们的下一任总统。运行至今日,埃及的政治体制和“1·25 革命”之前并无明显差别,出现这样的结果,与“1·25 革命”的仓促上阵有很大关系。

(三) 埃及“1·25 革命”缺乏有效的政治发展/转型方案

如前所述,埃及民主的发展基础相当薄弱,“1·25 革命”又是仓促上阵,这就注定以民主为主要诉求的“1·25 革命”难以形成完备的革命方案和明确的行动计划,这使得埃及虽然有政治变革的强烈需求,但是却不完全拥有实施成功政治转型的必备条件,尤其缺乏清晰有效的政治转型方案。埃及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窘况,与长期以来埃及推行的威权政治有关,在这种高压的态势下,国内政治自由度不足,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反对派自然也就难以形成,这就使得既有领导力量倒台后,埃及无法立即出现新的具有广泛号召力的新势力。也就是说,埃及威权领袖对反对派的长期强力打压,不仅埋葬了自己继续执政的可能,而且还剥夺了其他势力对领导国家的尝试,使得一旦自己的统治垮台,国家自然也就陷入剧烈且持续的动荡之中。

(四) 埃及革命追求的是距离自己非常遥远的西方式民主

在埃及自身民主基因并未成形的情况下,西方特别是美国式的民主就相当具有吸引力,而且美欧国家在中东地区也采取了一些推进民主化的举措,比如华盛顿在“9·11”之后推出的(西方式)民主改造中东计划,以及 2005 年压制穆巴拉克总统在埃及推行西方式民主等。尽管西方国家为自身民主的推广做了一些努力,埃及国内一些人对西方式民主也向往有加,但是埃及并没有成为西方式民主的温床,穆巴拉克总统被推翻后埃及广泛存在的社会和政治发展迷惘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不仅仅是在埃及,美英等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动用了包括军队在内的多种手段,迄今已经耗时十余年,都没能使这两个国家完成向西方式民主社会的转型。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很多埃及民众是高呼着民主的口号发动“1·25 革命”的,但是他们对民主的内涵并没有清晰的认识,没有搞明白埃及到底需要什么

样的“民主”或者说埃及的现代化是不是只能有西方化这一种模式？在历经近现代国家和民族屈辱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的进步与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向西方国家看齐，不管是生活方式还是政治发展模式，都产生了程度不等的“西方化”倾向。不管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看，还是从当代世界多个地区和国家的横向角度看，这个观点早已被证明是不恰当的。源于西方的词汇“民主”尽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但是其不同地区和国家，或者说在不同文化圈中的内涵是存在巨大差异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构建均要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能简单地照搬外部的发展模式。在历经“1·25 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剧烈动荡后，埃及人民对此会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简而言之，尽管“1·25 革命”的外部环境要优于伊朗伊斯兰革命，但是由于埃及民主基础的薄弱、革命爆发的突然、政治转型方案的缺失，以及民主诉求的不切实际，使得“1·25 革命”没能取得对埃及政治体制的重新建构。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gypt 1/25 Revolution and the Iran Islamic Revolution

FAN Hongda

(Fan Hongda , Ph. D , Associate Professor ,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Both Egypt 1/25 revolution and Iran Islamic Revolution sought to set up a new political system. Before the outbreak of revolutions Iranian King Pahlavi's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as inferior to the Egyptian President Mubarak. Iran had a strong leader and unified revolutionary forces. Egypt revolution was no popular leaders and the revolution strength was dispersive. Iran Islamic revolution did not start until it was ready , Egypt revolution suddenly broke out because of some external stimulus. Iran revolution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Egypt revolution did not create a new political system. Main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of Egypt revolution are sudden outbreak of the revolution , dispersive force , lack of complete action plan and fuzzy and unrealistic goal.

Key Words Egypt 1/25 Revolution; Iran Islamic Revoluti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Democratic Transition

(责任编辑: 钮 松)